

顾廷龙与《合众图书馆丛书》

沈 津

(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

【摘 要】 论文介绍了合众图书馆的建立,《合众图书馆丛书》的编辑刊印,以及顾廷龙先生编辑《合众图书馆丛书》的功绩与贡献。

【关键词】 顾廷龙;合众图书馆;《合众图书馆丛书》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establishment of He Zhong Library, the edition and printing of "Series Books of He Zhong Library" along with Mr. Gu Tinglong's achievements and contributions in compiling "Series Books of He Zhong Library".

【Key words】 Gu Tinglong; He Zhong Library; "Series Books of He Zhong Library"

顾廷龙先生是长寿者,在他九十岁以后的岁月里,终于编成并出版了他盼望数十年之久的《尚书文字合编》、《王同愈集》以及《读史方輿纪要》,同时还主编了《续修四库全书》,这些都是老先生为之高兴的事。尤其是前三件事,他认为的是却心愿的大事,因为《合编》是三十年代和顾颉刚先生一起合作的题目;王同愈是顾先生的外叔祖,于先生教益甚大;《纪要》的整理出版,则是叶景葵先生生前的夙愿。然而,对于晚年的顾先生来说,除了继续将《吴宪斋先生年谱》、《严久能年谱》的材料重加排此并交出版社外,最耿耿于怀的可能是对于“合众图书馆”的评价了。

那是缘于《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卷》出版后,内里的“上海合众图书馆”条目下注云:“见上海图书馆”,总共六个字。先生阅后,大不满意,他曾对来访的时在苏州大学任教的潘树广先生说:这“不免太简单了。‘合众’十五年经历,最为艰难之日,开办时在空无一物、空无一人的情况下进行。到捐献市人民政府时聚书三十万册,捐献后改名历史文献图书馆。我们编印了一册《中国现代革命史料目录初稿》,解放初中宣部同志说,你们有远见。此原公立图书馆不能做的事,十四年的时间不短,而且

经历了困难时期。‘见上海图书馆’一语,太简单了,太轻松了。”先生希望潘先生暇时写一篇对“合众”公正评价的文章。可惜的是,潘先生也于前二年去世了。我相信他一定有心想去达成老先生的心愿,但是天不假人,在时间上却是来不及写了。

本文并非为专门讨论上海合众图书馆在那个艰困的四十年代里,为国家、为民族保存那么多的传统文化和文献的功绩与贡献,而只是想通过当年顾廷龙先生所编《合众图书馆丛书》,来窥见“合众”工作之不易。

“合众”是在1939年7月,随着顾先生辞去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举家南下,抵达上海后才开始筹备成立的。它的创办人是时任浙江兴业银行上海总行董事长的叶景葵先生、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的张元济先生,以及曾任江苏省省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陈陶遗先生。之所以用“合众”之名,乃取“众擎易举”之意。

在三十年代的后期,上海地区已有普通者如东方图书馆、专于近代史料者有鸿英图书馆、专于自然科学者有明复图书馆、专于经济问题者有海关图书馆,至于中学程度所需要参考者有市立图书馆。而“合众”则是一个为保存固有文化而办的国学之图



书馆,其所收图书范围在搜集各时代、各地方的文献材料,供研究中国及东方历史者的参考。又由于历史的范围广大和它发生关系的学科很多,所以在形式上又不限于图书,凡期刊、报纸、书画、书札、拓片、古器、服物、照相、照相底片及书版、纸型等,亦均收存,务使与考史有关的东西,不致遭无人问津而毁弃。

关于《丛书》的编印,并非是临时起意即兴编辑的,而是自“合众”创立之日始,即表露在它的发展规划里了。在当时,创办“合众”的目的即在于“抗战以来,全国图书馆或呈停顿,或已分散,或罹劫灰。私家藏书亦多流亡,而日、美等国乘其时会,力事搜罗,致数千年固有之文化,坐视其流散,岂不大可惜哉!本馆创办于此时,即应负起保存固有文化之责任。”因此,在1939年8月,“合众”正式开始工作,这之后,即在12月之前,就应有此计划。

这一点,可以见《丛书》中叶景葵跋《恬养斋文钞》,叶云:“景葵近与二三同志创办合众图书馆,搜残编于乱后,系遗献于垂亡,已将敝斋旧藏悉数捐赠,此书亦在其列。今由馆出资排印,即作为馆刊《丛书》之第一种,其余篋衍稿本当竭绵力,陆续刊行,以传布先哲精神于万一。”此跋写于1939年12月。

《丛书》初集于1941年至1945年由合众图书馆汇编印行出版,为《恬养斋文钞》四卷,清罗以智撰。补遗一卷,叶景葵辑;《吉云居书画录》二卷,清陈骥德撰。补遗一卷,顾廷龙辑;《潘氏三松堂书画记》一卷,清潘志万辑。补遗一卷,潘承弼辑;《吉云居书画续录》二卷,清陈骥德撰;《李江州遗墨题跋》一卷,清王乃昭辑;《朱参军画像题词》一卷,清叶昌炽辑;《余冬璫录》二卷,清徐坚撰;《凫舟语柄》一卷,清许兆熊撰;《寒松阁题跋》一卷,清张鸣珂撰;《闽中书画录》十六卷首一卷,清黄锡蕃撰;《里堂家训》二卷,清焦循撰;《论语孔注证伪》二卷,清丁晏撰;《东吴小稿》一卷,元王实撰;《归来草堂尺牍》一卷,清吴兆騫撰。

二集仅一种,1948年2月编印出版,为《炳烛斋杂著》七卷,清江藩撰。内含《舟车闻见录》二卷续集一卷三集一卷、《端研记》一卷、《续南方草木状》一卷、《广南禽虫述附鳞介述兽述》一卷。均为

未刊之稿。《闻见录》多记清初国朝典章、边陲掌故及塞外名物,以至清初农田赋役,共160余则。是录原有十卷,今本非其完帙。《端研记》述端石品类及产地情况,盖江氏尝客两广总督阮元幕甚久,喜蓄砚石,且探究有得,宜其言之亲切。《续南方草木状》盖继晋嵇含之书而撰,记岭南草木凡四十余条,或得之故书,然大多亲所见闻。《禽虫鳞介兽述》,计三十余条,视前诸种书为驳杂,要为多识之助,初未必有意于著述也。

对于丛书来说,是汇集许多重要或难得的著作为一书,最便于学者阅读和流传。但由于中国的兵燹战乱及水火灾厄,图书极易散亡,学者访求困难,因而丛书的辑印,特别起到了流通书籍,便利研究者的作用。对于编纂《丛书》来说,并非一般人想像之易,即把数种图书拼在一起即可,而是每种图书都需事先校阅。即以《恬养斋文钞》为例,顾先生自1940年1月开始查阅它书,补其书缺字,在校样出来后,顾先生又仔细校过,直至是5月方才印出。

最有意思的是,《丛书》中没有一部是大部头者,而且没有刻本,所用底本都是稿本、抄本,且都是据该馆所藏,这大约是期在使先贤未刊之稿或刊而难得之作广其流传也。其为稿本者五种,为《恬养斋文钞》、《李江州遗墨题跋》、《闽中书画录》、《里堂家训》、《论语孔注证伪》。其他皆为钞本,计九种。于此可见顾先生等人极为重视抄本、稿本,其搜罗前人著述,不遗余力,发幽阐隐,功不可没,当年的《燕京学报》第二十六期在报道“合众”筹备近况时,也云:“一面校印前贤未刊之稿,嘉惠后学,以广其传。”

《丛书》开本不大,小本子,两集相加,收书仅十五种,竟然用了八年的时间,也可谓是“旷日持久”的了,由此亦可见当时编书出版之大不易。顾先生尝云“本馆丛书之辑,志在使先贤未刊之稿,或刊而难得之作广其流传,顾非一馆之藏之力所克胜任,缘商同志谋集腋成裘之举。所选著述以捐资者之意趣为指归,各彰所好,各阐所宗,学海无涯,造詣不一,要其专治所学,发抒心得,必有足贡献于后来者,勿偏持门户,勿执一绳,百采撷英华,视读者之去取何如耳。”

在当时的形势下,上海的物价日涨不已,几乎

使百姓每感不敷、惶惶不安。“合众”虽然仅有数人,但经费维艰,在各董事的筹画下,勉强渡过难关,即为编此《丛书》,顾先生也费尽口舌,求托朋友捐资代印。《吉云居书画录》、《潘氏三松堂书画记》为李英年捐资。《吉云居书画续录》、《李江州遗墨题跋》、《朱参军画像题词》、《余冬璫录》、《舄舟譚柄》、《寒松阁题跋》为礼髡龕主人捐资。《闽中书画录》为李氏拜石轩印行。《里堂家训》为袁鹤松、潘炳臣、冷荣泉、杨季鹿四先生合力赞助。《论语孔注证伪》、《东吴小稿》、《归来草堂尺牋》则为陈文洪独力担纲。

此项丛书的捐资者,也并非富商大贾,然而他们热爱中华传统文化,愿为乡邦文献流布而贡献一己之力,这是值得赞扬的。然而印书不易,还不至此。为了节省一点排版费,顾先生担当了其中几本书的书写工作,写就即可上机石印。顾在1995年10月4日致潘树广的信中说:“关于《合众图书馆丛书》,这是逐一积累起来,不是一次印成的。第一种是排印的,当时初创,图书馆创办人之一叶景葵,他收书重抄、校稿本,有愿将稿本逐渐印出。第一种清仁和罗以智的《恬养斋文钞》,第二种至六种皆有关书画者,李英年捐资,他爱好书画。焦循、丁晏、江藩三人著作是几位扬州营银钱者出资。照相石印印不起了,由我写药水纸直接上石者。图书馆的财力日绌,社会上物价日涨,抗战胜利后第二集印了一种,也是江都人著作,江都营银钱者捐资。时局动荡,物价飞涨,当时我亦苦中作乐也。”顾先生为《丛书》还写过一段发自肺腑之言,有云:“除此世变抢攘之日,物力凋削,旷古未有,《丛书》之印,先后六年,成书十有四种,编次不免芜杂,工事每况愈下,因陋就简,咎何敢辞,勉强为之,犹贤乎已,因便流通,汇编成集,述其缘起如此。”

实际上,顾先生本人那时的日子也是过得紧巴巴的。津尝读顾先生日记,1945年1月8日云:“然余月入不敷甚钜,正在托嘉将李英年所赠布一匹出售。明日又候书估将《邃斋集古录》等让人,区区之物,不够一鬻。一两月尚有维持,以后不了,虽目前无论何处薪金不足以贍家,然负最高责任者亦当为职员思之。”也是同月,在征得叶景葵同意后,顾先生又将自家所藏图书十四种,价让“合众”,得款三

万元,以交儿子诵芬学费。二月,新年即临,顾夫人斥金饰度岁,盖“已鬻书若干种,物昂不足维持,文人不事生产,所持者薪水。今薪水所入尚不给,若余者绝不愿谋分文不义之财。于是,自束至一无罅隙处,此忧患亦无愧无怍矣。”故先生又叹曰:“生活维艰。年况愈下,思之凄然。”

别小看了这部《丛书》,如果将之和其他同类丛书相比,或有其优之处。其所收之书均有跋文,重点介绍所印图书之价值。如叶景葵撰《闽中书画录跋》,约四百字,有云:“今观《书画录》,以吾杭李氏晞曾《八闽书画记》为蓝本增辑,凡五易稿,由二百余家增至八百余家,所采之书,多至三百二十余种,其致力于谓勤矣。”又如张元济撰《吉云居书画续录跋》,介绍作者陈骥德甚详确。而顾先生所写计有六种,其《归来草堂尺牋》,跋云:“此册未经刊行,附诗述怀一首,亦出集外,尤为可珍。详览诸札,可见兆騫生平志节与当日塞上景物,足备故乘之遗,即此鳞爪,岂可等闲尺牋视之哉?爰为印行,以广流传。”另《余冬璫录》二卷,原为徐坚手稿,曾经沈钦韩朱笔删润,间有钦韩按语。此书乃为1941年文禄堂书估王文进(晋卿)借与顾先生传录者,后顾即依沈钦韩校改正写定,付诸石印,为艺林添一掌故。六种中跋《舄舟譚柄》为《顾廷龙文集》失收。

据《中国丛书综录》的著录,总共包括了当时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四十一馆的丛书、共2,747种之多,但是其中编辑、出版于四十年代者,却非常之少,笔者曾作过一个初步的统计,仅有50种左右。而有图书馆背景者,除此《合众图书馆丛书》外,还有《玄览堂丛书》(又有《续集》、《三集》,郑振铎编,国立中央图书馆出版)、《边疆丛书续编》(吴丰培编,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出版)。当然,直接打出自己的旗号而为《丛书》的,还有一种《私立北泉图书馆丛书》,那是民国间怡兰堂刻本,所收书八种,或是在四十年代之前出版者。此外,1937年出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也是编得很好的一部丛书,虽仅收有十一种,但每种都有谢国桢的跋文。

一个成立于三十年代末,主要活动在四十年代的“合众”,在数本所谓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史上,都没有一席之地。这也并不奇怪,因为(下转第72页)



借书园的藏书,周永年运用了多种方式:一是买书。二是抄书。在京编修《四库全书》期间,他就曾抄写从四库馆中借出的秘籍珍本,并得到桂馥的帮助。桂馥《晚学集·周书昌传》说:“借馆上书,属予为《四库考》,佣书工十人,日抄数千纸,盛夏浇灯校治。”三是刻书。曾借李文藻家刻的木版,印行《南涧文集》。四是接受捐书。他的许多朋友都为他的精神所打动,除桂馥外,历城县令胡林延、青州李文藻等人都曾向借书园捐过书。通过努力,借书园的藏书量一度颇为可观。支伟成的《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中就提到:周永年“积储近十万卷,古槧缮钞希观之本略具”。由于周永年藏书的目的不在于炫私,而在于为他人提供方便,因此借书园建立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受到学子们的好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周永年的藏书一再散失直至借书园最终夭折。

4 周永年藏书理想述评

在中国历史上,尤其在私人藏书极盛的清代,著名的藏书家很多。但是使他们青史流芳的原因却不尽相同。有的人是因为藏书丰富,有的人是因为保存了许多珍本,而周永年却是由于他的藏书理想和精神而名垂千古。“儒藏说”汇聚了周永年藏书、用书理想的精华,也是对封建社会藏书工作和内容的概括和总结。“借书园”的出现则标志着中国古代

藏书思想发展到新的阶段,是中国传统封闭式藏书开始向近代开放式藏书转变的一个信号。周永年的藏书理想和行为可以看作是现代图书馆公开公平原则的发端,为中国图书馆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不可否认,周永年的“儒藏说”带有很多幻想的色彩,在封建社会的体制之下,难免出现孤掌难鸣的窘境。但周永年和“儒藏说”在中国藏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容抹杀的。周永年是我国18世纪藏书史上当之无愧的先驱人物,他的历史功勋值得我们展开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 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上海:上海书店,1983.
- 2 叶衍兰,叶恭綽.清代学者像传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3 杨立诚,金步瀛.中国藏书家考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4 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见: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1982.
- 5 周永年.儒藏说.见: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1982.

(作者信息: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日照校区图书馆资源建设部馆员,邮编:276826.收稿日期:2005-05-13.)

编校:邹婉芬

(上接第66页)在当年灯红酒绿的上海滩蒲石路(今长乐路、富民路口的转角)746号上的“合众”,确实从来就没有悬挂出自己的图书馆招牌,因为它不想张扬,不管地处法租界也好,还是上海沦为孤岛后,也抑或抗战胜利后,除了像钱钟书、郑振铎、马叙伦、胡适、徐森玉、顾颉刚、王重民等重要学者时有光临外,一般人是不知“合众”的底细的,因为这是一个带有研究性质的图书馆,而不是公共图书馆。

然而,也正是这么一个在一般人看来并不起眼的小图书馆,竟然在五十年代初期,已拥有了三十万册古籍善本及线装书的收藏,还有各种稀见的文献资料,包括共产党早期文献。不仅如此,在四十年代时,中国尚有数十个规模不小且也有名气的图书馆,或许是有大的难处,要照顾方方面面的事,所以尽

管拥有较为丰富的资源,但是有为的甚少。“合众”是小图书馆,却能利用馆藏流通图书,在艰困的条件下,居然印出了自己的《丛书》。可见小馆也能办大事,“合众”功莫大焉。

这套《丛书》虽说是四十年代的出版物,可是流传到今天却是已经不多的了。查《中国丛书综录》,计有十五个图书馆入藏。附带说说,1949年时“合众”征集到宗惟恭辑刻的《咫园丛书》的版片,于是重印出版。这部《丛书》共有《金陵古金石考目》一卷、《刻碑姓名录》三卷、《官阁消息录》一卷、《江淮旅稿》一卷、《嘉荫彙集》二卷五种。

(作者信息: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收稿日期:2005-04-02.)

编校:刘勇定

